

· 药物史研究专题 ·

清代以来禹州药材市场发展 与药市“道地药材”的形成

朱绍祖

(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 重庆 401331)

摘 要: 禹州是全国四大药材集散地之一, 不仅本地药材资源丰富, 而且汇聚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药材。禹州丰富的药材资源虽不构成药市形成的决定因素, 却为药材市场交易提供了大量的物资来源。清中期以后, 禹州及其周边地区出现了专业化的种植区, 药材产量颇为可观, 以禹白芷、禹南星、会全蝎、禹白附子为代表的道地药材在禹州药材市场中逐渐形成。然而它们并非完全产自禹州, 而是有相当一部分产自周边地区, 共同参与到药市“道地药材”的建构之中。清代以来一些著名药市的药材种植乃至“道地药材”的形成多表现为一种典型的商业文化现象, 要重视市场机制和人文因素在形塑药物观念中的作用。

关键词: 禹州; 药材市场; 道地药材; 清代

DOI: 10.16307/j.1673-6281.2023.01.002

中图分类号: R282; F32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6281(2023)01-0011-11

Development of Medicinal Market and Formation of “Geo-authentic Medicines” in Yuzhou since the Qing Dynasty

ZHU Shaozu

School of history and society, 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 Chongqing 401331, China

【Abstract】 Yuzhou is one of the four major distribution centers of medicinal materials in China, enriched with not only local medicines but also medicinal materials from all over the country. Although Yuzhou's abundant medicinal materials do not constitute a decisive factor in the formation of the medicinal market, they provide a large number of material sources for the market. Since mid-Qing dynasty, specialized planting areas had appeared in Yuzhou and adjacent regions with considerable medicinal products. Genuine medicines such as Yubaizhi (*Radix Angelicae*), Yunanxing (*Rhizoma Arisaematis*), Huiquanxie (*Scorpion*), and Yubaifuzi (*Rhizoma Typhonii*), both from Yuzhou and surrounding areas, gradually won their fame as geo-authentic medicin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Yuzhou medicinal market and became representatives in the jointly construction of the geo-authentic medicinal market. Since the Qing Dynasty, the cultivation of medicinal materials and even the formation of “geo-authentic medicines” in some famous medicinal markets have

[基金项目] 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019BS013); 重庆师范大学校级基金项目(19XWB019)

[作者简介] 朱绍祖(ORCID: 0000-0001-8933-8902), 讲师, E-mail: zhushaozu2010@163.com

clearly reflected a typical commercial and cultural phenomenon. Thus, importance should be attached to the role of market mechanism and humane factors in shaping the concepts of medicinal materials in relevant researches.

【 Keywords 】 Yuzhou; Medicinal Market; Geo-authentic Medicinal Materials; Qing Dynasty

药材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其产地具有很强的地域性，这就使得药材的“道地性”格外受到重视。以往有关“道地药材”的研究往往侧重于药材的本草考证，而忽略了人工培育、种植技术进步、商业贸易的形塑等因素在促进新的“道地药材”产区形成所扮演的角色^①。长期以来，学界在论述四大“药市”（安国、樟树、禹州、亳州）^②的成因时，大多是从自然环境方面加以解释，认为该地皆有其道地药材，并冠以“祁”“禹”“亳”等名号，吸引各地药商前来采购，促进了药市的繁荣^③。实际上，这些叙述往往忽略了商业和人文等因素对于“道地药材”的建构和形塑。就四大“药市”之一的禹州而言，我们通过对雍正《河南通志》的调查和统计发现，清中叶河南全省出产“药类”共计 73 种，产地遍布 41 州县^{[1]92-93}。通常而言，方志记载多为地方名优特产，然而并无禹州出产道地药材的记载。这至少说明在雍正时期，禹州尚无特别有名的地产药材。然而今天人们所熟知的禹白芷、禹南星、禹白附、会全蝎等药材，又是如何成为禹州药市的“道地药材”，是否深刻影响了禹州药市的形成，尚少有学者作深入探讨^④。因此，本文对商业贸易作用下的禹州药材种植和药市“道地药材”的形成作研究论述，以期进一步揭示商业、市场等人文因素对“道地药材”的形塑和影响。

一、清代以来禹州药材市场的发展

禹州，古称阳翟、颍川、钧州。明万历三年（1575），因避明神宗朱翊钧名讳，故改钧州为禹州。清初，禹州属开封府管辖，领有密县一县。雍正二年（1724）升禹州为直隶州，以新郑、密县二县来属。雍正十二年（1734）降为散州，乾隆六年（1741）复隶开封府。民国时期，废州立县，改禹州为禹县。1988 年，禹县撤县改市，设立禹州县级市，归许昌市管辖。时至今日，禹州成为全国著名的四大药材集散地之一。然而，有关禹州药材集散地的形成时间，目前主要存在两种说法，其一为洪武初年说，其二为清代说。

唐廷猷认为明代全国性的药市首先出现在禹州，“洪武元年，（朱元璋）就诏令全国药商去禹州集结交易，初步形成全国市场”^{[2]362}。然而，据刘凤的考察，“诏令开药市”的说法并不见诸历史文献记载^[3]，因而其可靠性不免令人生疑。另一说法，以许檀为代表，其认为禹州药材市场的兴起当始于乾隆年间，主要依据为同治二年《诰授朝议大夫调署禹州正堂马宽夫马大老爷永禁开设车行碑记》。碑刻中提到禹州药市的发端是乾隆时当地商人在地方政府支持下，与密县洪山庙药市竞争的结果^[4]。

① 参见郑金生：《“道地药材”的形成与发展》，《中药材》1990 年第 6-7 期，第 39-40，43-45 页；郑金生：《药林外史》，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年；梁飞：《道地药材考》，北京中医药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 年；汪燕平：《清以来宁夏枸杞作为地道药材的形成史》，《史林》2017 年第 3 期，第 67-76，220 页；朱绍祖：《明清怀庆地黄的种植与贸易》，《古今农业》2018 年第 1 期，第 60-66 页。

② 一说为安国、樟树、百泉、禹州。

③ 参见周鸯：《试论四大药都形成与发展的影响因素》，中国中医科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16 年，第 81 页；胡世林主编：《中国道地药材》，哈尔滨：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 年，第 20-23 页。

④ 参见路登云：《禹州药市鸟瞰》，《光华医药杂志》1934 年第 1 卷第 3 期；杨继伟：《清至民国禹州药帮初探》，厦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 年；许檀：《清代晋商在禹州的经营活动——兼论禹州药市的发展脉络》，《史学集刊》2020 年第 1 期，第 43-53，64 页。

禹州地处伏牛山东麓和嵩山南麓的平原地带,是连接山区、平原贸易的交通要道,“控汴洛之区,通汝颖之道,山川磐迂,形势险固”^[5]。就全国形势而言,“遥接嵩高,近连圃草,直走荆襄,远达滇黔,为中州之咽喉”^{[1]192},又处在北京通往荆襄、滇黔的通衢大道上,具有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交通运输条件。就密县而言,尽管当地“山路崎岖,药物难运”^{[6]258},但因是洪山信仰的起源地,其庙会颇为兴盛,是明清时期中原地区重要的药材市场^[7]。密县在雍正之前为禹州属县,境内东南方向有洪山庙,肇建于元代,至明代兴起清明庙会^[8],以纪念亡故于此的“洪山真人”。据道光《尉氏县志》记载,清初,流寓尉氏的徽商方隆“赴密之洪山收买药材,其地实五方药旅辐辏之所也”^[9]。乾隆时期著名文学家李绿园的小说《歧路灯》也曾描绘道:王春宇“在本省禹州横山庙买的伏牛山山楂、花粉、苍术、桔梗、连翘等粗货……卖完好赶郑州庙会,再购药材回汉口”^[10]。其所说的禹州横山庙当为禹属密县之洪山庙。可见,清代前期的密县洪山庙,因庙兴市,当不失为河南重要的药材交易场所。虽然洪山庙有“洪山真人”信仰的基础,并且吸引了山西、陕西、安徽、四川、河南及江南等地的药商到此贸易^①,但是因地处嵩山边麓,山路崎岖,运输维艰,交通位置并不优越。至乾隆十七年(1752),“众首事以禹州道路平坦,搬运较易,且人朴风古,请以众商人迁禹做买做卖,往来脚运,俱听客便。不数十年间,商贾辐辏,遂称胜区”^{[6]258}。在禹州州判何宏瓚的主持下,密县洪山庙药会迁移至禹州,为禹州药材市场的繁盛奠定了基础。此后,禹州药市规模不断扩大,自乾隆至道光年间,每年三月份举行一个月的药材交流大会,到光绪年间,“虽年分三会,实终岁辇药络绎也”^{[5]652}。

禹州药材市场蓬勃发展,汇聚了全国各地的地产药材,如内蒙古的黄芪、甘草,甘肃的大黄、当归,宁夏的枸杞、麻黄,山西的党参、柴胡、远志等。这些药材由骆驼、骡马等驮运至洛阳,然后以人力挑担及土车运送等方式翻越伏牛山进入禹州;川、广、云、贵地产贵重药材,大多经汉口北上,由水路运至老河口,再经陆路转运至禹州;东南方向的苏、皖、闽、赣诸省及海外进口药材,几经转运,由安徽溯颍水至周口,转陆运至禹;北方诸省经水陆转运,舟车而至^[11]。民国《禹县志》载:“药材则非禹产,而以禹为委输者也。内而全国二十二省,外越西洋、南洋,东极高丽,北际库伦,皆舟车节转而至。”^{[5]653}禹州药材市场的兴盛催生了以经营类别或区域性质划分的药行帮、药棚帮、甘草帮、党参帮、茯苓帮、江西帮、怀庆帮、祁州帮、陕西帮、四川帮、老河口帮、汉口帮、宁波帮13个药帮。这些商帮通过各自建立的商业网络,将集聚于此的药材贩至其他地区,提升了禹州药材市场在全国的影响力。

值得注意的是,药材在进入市场成为商品之前,其生长受到人为因素的干预较小,自然环境是决定其分布的主要因素,然而当药材成为流通的商品以后,其生产便容易受到人为因素的影响。禹州药材贸易的兴盛,不仅吸引了西北、西南、东南、华北等地药材集聚,而且深刻地影响了药市本地农民的药材采集活动,“禹为药材汇聚之区,填满街市犹粪土也。故农家抑或渐其风,牟其利,深山大壑,采药者往来不绝”^{[5]615}。禹州西部及北部山地丘陵地区野生药材资源丰富,乾隆时,河南巡抚尹会一奏称:“其中烧灰炭、砍木植、采木耳、刨药材之人,又皆棚居穴处。”^[12]然而野生药材资源毕竟数量有限,庞大的采药队伍和过度的樵采活动破坏了野生药材的生长环境,以至于采集越发困难。因此,仅仅依靠自然采集野生药材难以满足市场的需求,规模化的人工种植药材活动应运而生。

二、禹州药材贸易与当地的药材种植

中国地域辽阔,各地的地形、气候、土壤、光照、温度等条件不一,同一种药材产地不同,其产量

① 据乾隆二十九年《重兴清明盛会碑记》记载,参加清明盛会的有温县、孟县、密县、许州、柘城、鲁山、亳州、阴山县、华县及山西绛县、江南、陕西、四川等地药商或商号。

和药效往往具有明显的差异性。经过长期的观察和比较,医药行业“道地药材”的观念逐渐形成^[13]。然而,随着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改变,“道地药材”的产地并非固定不变,而是因时因地发生变化,并且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

在禹州药市取得突破性发展之前,当地民间自发的药材采集、种植和贸易活动缓慢持久地进行。横亘于禹州、密县两地交界的具茨山和大隗山是该地区最主要的野生药材产区。采集野生药材的同时,种药活动和药材贸易在唐宋时期亦获得初步发展。后晋时,户部尚书卢损致仕后,曾隐居禹州具茨山“立隐舍,诛茅种药,山衣野服”^[14]。北宋时,禹州的药材种植和贸易活动悄然兴起。梅尧臣有《种药》诗曰:“云外阳翟山,实与嵩少接。山中采药人,能自辨苗叶。当须斫其根,以遂素所惬。”^[15]可见当地药农凭借长期的生产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种药知识和经验。药材种植日渐兴盛,带来了药材贸易的发展。沈括《梦溪笔谈》载阳翟县杜五郎“唯与人择日,又卖一药,以具饘粥”^[16],卖药已成为一些人谋生的手段。尽管宋代禹州的药材种植和贸易已然兴起,但远未形成规模,种药、采药和卖药不过是地方性和自发的零星行为,性质上更接近于家庭副业,其社会影响力有限。元明时期,亦未见有快速发展。直到清代以后,随着禹州药材贸易的兴盛,在不能满足市场需求的情况下,药材生产便更多地受到人为因素的影响,从而促进本地农民的药材采集和种植活动。

实际上,在开放的市场体系中,农民也并非完全固执保守,而是存在着一定的经济理性。在种植粮食等作物收入有限的情况下,根据土地的适宜程度,合理安排和调整种植结构,更能充分发挥其经济效益。相对于其他农产品,药材的种植通常能够带来更多的收益。民国《禹县志》指出:“禹为药材汇聚之区,填满街市犹粪土也。故农家亦或渐其风,牟其利。”^{[5]615}禹州药材市场的发展,使本地农家深刻地认识到种植药材比经营一般的农作物利润更加丰厚。每年药会期间,药商定期到禹州从事药材贩运活动,市场需求量巨大,药材拥有广阔的销路。这种商业化的氛围,必然影响到周边的乡村,导致传统农业经营方式的转变,激发了农民的药材生产积极性,“昔之种菜或与菰蓝相更代,今之种菜与草药相和揉,皆所谓争时也”^{[5]613}。禹州中部和东南部的冲积平原,土壤肥沃,素来为粮食主产区。然而,到晚清民国时期,随着禹州药材市场的发展,药材销量巨大,运用范围增广,“其习用销广者,或分稼穡之田种之”,颍川、镇定、紫金三里农户专门分出庄稼地种植药材。其所种植的药材种类颇为丰富,“白菊、白芷、南星、玉米、防风、荆芥、罂粟之属,动连畦陌,与五谷桑麻相掩映。杜仲森森成林,紫苏、薄荷、山药、百合、海南参、牛蒡子之类,杂植蔬圃。其余或以花草养之,红药当阶,点缀风景者,又往往而是也”^{[5]615}。在禹州古城寺以东地区,“易井泉六谷外,杂艺南星、白芷、菊花、薏苡之属,要之其惯习为常者”^{[5]650}。

到晚清民国时期,药材作为一项对外出口贸易的重要商品,不失为挽回国家利权的一大利源。民国《许昌县志》甚至感慨:“许地产药四十余种,惟县西北石固镇一带,紫苏、薄荷、薏米等颇称大宗,每岁销路颇畅。……惜县人不知注意经营,致令货弃于地,未免坐失利源。”^{[17]293}有鉴于此,禹州知州曹广权在任期间,投入了相当多的资金和技术,鼓励药农培育药材,用以支持药材产业的发展,“药材黄连、石斛各种,亦议种实移根,以资推广云”^[18]。曹广权的积极鼓励和引导行为,使得清末禹州地区的药材种植呈现繁荣景象。即便是抗战时期,禹州的药材贸易和药材种植也极度繁盛,《中央日报》称禹州为“华北总药房”,并指出:“几乎全国的药材都梯山航海地汇集在这俗名‘小禹州’的城里,然后再分散到天南地北。药是繁荣小禹州的主宰,也是小禹州的生命,灵魂。全城都是药店,满街充溢着药香。城中的旅客,虽然有的来自云贵,有的来自巴蜀,有的来自甘青,但归纳起来不外两种,不是卖药的就是买药的,如果找得出第三种,一定是卖药而又兼买药的。”^{[19]60}

由于清代统计资料的欠缺,我们暂时无法详细了解到当时的药材生产状况。不过,根据植物学家时从夏对1940年河南药用植物及禹县药材的调查,我们或可对民国时期的禹州药材生产状况有所了解(表1)。

表 1 民国时期禹州药材种类及产量统计表

药材种类	产量 / 斤	药材种类	产量 / 斤	药材种类	产量 / 斤
女贞	5 000	苏子	10 000	茜草	10 000
猪牙皂荚	1 500	苏叶	30 000	土三棱	30 000
桃仁	300 000	小茴	30 000	蒺藜	100 000
枸杞	20 000	牵牛子	10 000	土黄	500
白芷	700 000	牛蒡	20 000	紫花地丁	1 000
南星	150 000	牛子	10 000	王不留行	500
白附子	50 000	枣仁	20 000	旋覆花	1 000
薄荷	200 000	葵皮	5 000	葶苈子	5 000
玉米	100 000	土贝母	3 000	千金子	5 000
荆芥	100 000	车前	10 000	马鞭草	10 000
洋草	10 000	瞿麦	4 000	冬葵子	1 000

注：资料来源于时从夏《河南药用植物及禹县药材之调查（附图表）》，《国立河南大学学术丛刊》1943 年第 1 期，第 124-133 页。

据表 1 统计，禹州本地大宗种植的药材种类共计 33 种，年总产量达 1 922.5 万斤，产值达 137.8 万元。就种植规模和产量而言，又以白芷、桃仁、薄荷、南星、荆芥、玉米、蒺藜、白附子等为最大。尽管药材种类方面，民国时期的统计数量无法与清代禹州地方志记载相比，但这并非意味着这一时期药材种类和产量的减少^①，如民国《禹县志》指出的“药类不胜枚举，取其多者”^{[5]614}。显然，民国方志所列药材仅为禹州出产最为丰盛的部分，由此推及，时从夏的统计当也不例外。从某种程度上来看，这反映出禹州药材市场的药材生产呈现出专门化和规模化的现象。

三、禹州药材贸易与周边的药材种植

任何社会现象在地缘相近以及社会发展进程相似的地域社会内，都不可避免地引起一定的联动效应。禹州药材市场凭借其强大的药材集散能力，对周边地区产生深远影响。药材集散地的形成和发展，不仅使得药材贸易有利可图，还促进了禹州境内的药材种植，同时也推动毗邻诸县药材种植规模的发展，从而将禹州及其周边府县的药材生产纳入药材市场的贸易网络之中。

密县作为禹州北部邻县，乾隆以前长期为禹州所管辖，境内盛产多种药材，以金银花最为著名。嘉庆以前，密县就已大量种植金银花，而且产量巨大，“鲜者香味甚佳，山中种植者多，颇获利”^[20]。密县西北的五指岭一带，山岭层叠，乱石纵横，不适于播种，于是村民利用石缝种植金银花，每年出产约 5 万斤（每斤时价 5 角以上，约有 2.5 万元的收入）^[21]。密县发达的金银花种植，为禹州药市提供了丰富的货源。道光以后，禹州境内亦大范围种植金银花，并于晚清民国时期形成规模。据曹炳章《增订伪药条辨》载，

① 嘉靖《钧州志》收录有 45 种药材，顺治《禹州志》收录有 56 种药材，乾隆《禹州志》收录有 55 种药材，道光《禹州志》收录有 58 种药材，民国《禹县志》收录有 45 种药材，且记载“药材不胜枚举，取其多者”。

金银花“禹州产者为禹密，花朵较小，无细毛，亦佳”^[22]。禹州西部、北部的浅井、茆庄、无梁等地与密县接壤，多为山地丘陵，自然环境湿润，透气性强，均有金银花种植，成为河南重要的金银花生产基地。民国时，鄢陵县也大量出产金银花，“处处有之，二三百斤不等，每斤三角，禹州分销各省药房”^[23]。

除了金银花外，禹州及其周边的甘草种植颇为兴盛。尽管甘草主要出产于西北及蒙古草原等高寒地区，“然亦不必限定，寒地而外，大概亦可生育，唯以土质之选择为第一”^[24]。甘草作为禹州药市流通的最大宗药材之一，“十三帮”中三个以经营药材种类命名的药帮即有“甘草帮”。“甘草，产于草地，以河南禹州为销场。常年贩运，多在五、九两月，每船装四五十捆，约一万六七千斤”^[25]。近代以来，甘草除了具备传统的药用价值外，还用于制造口香糖和香烟等工业原料^[26]¹¹。一战时期，原本供给欧美市场的土耳其甘草严重短缺，欧美国家转而向中国大量进口甘草，“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一年，中国甘草出口特别旺盛”^[27]。国际市场的庞大需求和丰厚利润推动了国内各主要药材市场的供给，深刻地影响了内陆地区的禹州药市，甘草种植颇为兴盛。禹州和许昌等地皆出现了甘草等药材的专业化种植区。据1929年的《河南新志》统计：“许昌与禹县接壤处，盛产甘草，每年约产七万余吨。又产薄荷，每年约三百三十余吨，系由许昌铁路输出，行销祁县、汉口等处。”^[28]¹⁹²随着本地药材种植的兴起，禹州逐渐由原来的药材转输功能转变为自行外输，成为多种药材的生产基地。

清末民初，随着京汉铁路的通车，许昌和长葛两处车站分别成为禹州及周边地区药材转输的重要中转站。禹州药材集散地的形成，大量的药材交易，以及便利的铁路交通，进而刺激到许昌药材种植的发展^[29]，药材的种植发展很快，由野生转变为家种，外地引进品种增多，“许地产药四十余种，惟县西北石固镇一带，紫苏、薄荷、薏米等颇称大宗，每岁销路颇畅。其余黄芪、地黄等，遍地皆是”^[17]²⁹³。正如王兴亚指出的“河南辉县、禹州药材贸易中心的形成，也大大促进了河南的药材生产”^[30]。因此，禹州及其周边药材种植业的兴盛，并非是原本自发形成的，也并不构成药市形成的原因，而在相当程度上是商业贸易和市场需求直接影响下的结果。尽管如此，药材种植产业的发展却为药市的持久繁荣提供了充足的药材资源保障。民国《河南新志》称：“禹县……自昔为药材荟萃之区。辉县、沁阳、济源、洛阳、鹿邑、西华、商城等处，及其他各县所产种类至繁，由商贩运输至此，俗称药材会，行销于蜀、甘、秦、晋等省为最多。”^[28]²⁷⁶

四、禹州“道地药材”的形成

药材产于不同地区，各种道地药材常冠以地名，医者治病用药，也常以“道地药材”为上。对于“道地药材”，以往多是从强调原产地的角度来认识。随着药材需求量的不断增加，各地野生药材已无法满足药材市场的供给。开拓新的药源、进行药材的引种和培育，成为解决药材短缺的重要手段。禹州及其周边农民不仅种植诸如甘草、金银花、黄芪、地黄之类的他产药材，而且积极培育本地的道地药材，如禹白芷、禹南星、禹白附、会全蝎等。虽然今日所谓的禹白芷、禹南星、会全蝎、禹白附四大“道地药材”被作为名片广为宣传^[31]，但这些植物类或动物类药材，皆非一开始就享有盛名，而是与清中期以来的药材市场发展，以及当地的积极培育和市场推广有着紧密联系。

（一）白芷

白芷，为多年生草本伞形科植物，以根部入药。宋代以前的白芷多为野生，且以河东和吴地为盛。宋人苏颂《本草图经》载：“白芷生河东川谷下泽，今所在有之，吴地尤多。”^[32]¹⁷⁹到明清时期，随着社会流动性的加强以及商品经济的发展，白芷的人工培植活动已相当兴盛，进而导致白芷道地产区的拓展。卢之颐所著《本草乘雅半偈》载有：“白芷，所在有之，吴地尤多，近钱唐、笕桥亦种蒔矣。”^[33]²⁷²可见，到晚明时期，白芷已由纯粹的野生变为人工培植。

在白芷种植技术的传播中,官员的经常性流动是促成其传播的一条重要途径。四川遂宁的白芷种植,据说是由明代做官浙江的遂宁人带回^[34]。此后,四川的白芷种植规模逐年扩大,以“川白芷”之名在市场上占据重要地位。白芷道地产区由山西和浙江扩展至四川地区。然而,就禹州而言,当地的白芷培育活动直到清代以后才逐渐展开。乾隆时期,长葛画匠王村药商乔金山引进白芷,培育多年,试种成功,到光绪末年,该村种植面积达七八十亩^{[35]93}。尽管乔金山是通过何种渠道获得了白芷的种植技术我们不得而知,但这至少表明除了官员流动外,商业贸易也是药材种植技术传播的重要渠道。自白芷新的种植技术传播至河南以后,白芷的种植范围逐步发展到长葛的后河、坡胡、石固、增福庙及禹州的郭连、古城一带,形成地跨两县的白芷种植区域^{[35]93}。

到清代,由于人口流动性的加强和商业贸易网络的拓展,白芷在全国的种植范围不断扩大,但是在专业的本草学家和药商看来,各地出产的白芷在品质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性。药物学家陈仁山指出:“白芷,产四川为正,味馨香;有产浙江宁波、杭州等,名宁波芷,又名老头芷,味辛辣,不适用;有名会芷,产河南,如无川芷,则用会芷亦可。均夏季出新,又名芳香。”^{[36]34}由此可见,随着药材培植技术的进步,后发的四川和河南的白芷逐渐受到市场的青睐,甚至超越了早先浙江的道地产区。药商王植周亦指出:“杭芷、宁波芷、老头芷,味辛辣不适药用,统称土白芷,河南禹州产者,富芬香而品质亦优。在川产芷者,崇庆州之三江口、渠县、中江、遂宁等处。……次则推禹州芷。”^[37]在药学家和药商的论述中,多以出产于禹州者为佳。

实际上,这与晚清以来白芷产地和药材市场的不断扩张密不可分。产自禹州境内及周边诸县的白芷大都经由禹州转销至郑州、亳州、祁州(今安国市)、汉口等药市,逐渐享有盛名,称为“禹白芷”或“会白芷”。笔者收集到一封民国书信,信中谈及:“郑市贸易公司药材部挂牌,川贝母 42 万,只卖 2 斤,川芎 23 万,□□ 25 万,瓜□ 2 万,□欠川芎私商□货,天冬 5 千,冬花 1 万 8 千,连翘 9 千,黄连□万,山药□ 28 千,□□□ 3 千,泽夕□万箱,贡香 13 万,禹白芷□千,黄药子 35 千,白药子 35 千,花□附 2 千,即请大安。”^[38]郑州药商在书信中对采购的白芷直接以“禹白芷”相称,这表明“禹白芷”已经成为药商极为看重的“道地药材”。此外,在祁州和汉口,禹白芷也有相当广阔的销售市场。根据 20 世纪 30 年代的调查,“白芷集中于和尚桥车站,每年产 80 吨(16 万斤),运销汉口和定州”^[39]。亳州作为另外一处知名药市,其药界对禹白芷有较高评价,“香白芷、白芷香,白芷出在洪河两岸上,菊花心、气芬芳,药到病除一扫光”^[35],表明了当地市场对禹州白芷的认可程度。

清代禹州药材市场的发展,不仅将外地的白芷种植技术引入当地,到晚清民国时期,当地还将此知识技术进一步传播。清末,河北祁州药市从禹州引种白芷,广为发展,最终形成了川白芷、禹白芷、杭白芷、祁白芷四大生产基地^{[2]235}。不过,尽管祁州药市鉴于庞大的市场需求,引进了白芷种植技术,但是祁州出产的白芷品质有限,并未能在国内药材市场上占据优势地位。据 1935 年到 1937 年赵燏黄对北平、祁州等地药肆的调查发现,当地市场上的白芷主要来自杭州和禹州,杭白芷因路途遥远,价值更贵^{[40]91}。祁州药市上的禹州帮,来货中白芷占有极大的份额。祁州白芷未能引领本地市场,或许与当地较晚引进白芷种植、所占据的市场份额有限有一定关系。

由于祁州、汉口等外地市场的庞大需求,禹州白芷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市场的扩大固然为禹州药材输出提供了便利,但是市场价格更多地取决于国内外市场的商业状况,专业化生产使禹州对外部消费市场严重依赖,因此,也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出口需求的减少导致价格暴跌,无论药农、药商均蒙受巨大的损失。到 20 世纪 30 年代,“禹州白芷在前数年市价涨高,故该地农民竞争种植,以致出品增加,市货拥挤,致价值又低落(每担由 20 余元落至 3~4 元),年来禹州之种白芷者,已不如前数年之踊跃矣”^{[40]91}。虽然如此,根据 1940 年统计显示,禹州白芷年产量达 70 万斤,每担值 25 元,总价值达 175 000 元,产量居于各类禹产药材之首。1944 年,《中央日报》记者指出:“几乎全国的药材都梯山航海

地汇集在这俗名‘小禹州’的城里，然后再分散到天南地北……药的气息还远播于农村，许多农民也把一块块的土地栽上白芷、小茴香之类。”^{[19]60}可见在 market 需求的驱动下，禹州的白芷种植遍布乡间村落。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晚清民国时期白芷的消费需求扩大，导致禹州成为全国最为重要的白芷产地之一，但是在白芷成为禹州“道地药材”的过程中，药物学家的参与和市场因素的推动也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药学家赵燏黄、陈仁山等人对白芷的调查论述，某种程度上也影响了人们对白芷道地性的认识，禹州白芷在市场上的迅速走俏，使其更加受到关注，推动着“禹白芷”成为禹州药市典型的“道地药材”。

（二）天南星和白附子

天南星和白附子均见于明清两代禹州方志记载，生产历史较为悠久，但是真正发展成为禹州“道地药材”的时间相对较晚。天南星最早以虎掌之名收载于《神农本草经》之下品，天南星之名最先收载于宋《开宝本草》。到李时珍时，认为此二物为一物。李时珍指出：“虎掌因叶形似之，非根也。南星因根圆白，形如老人星状，故名南星，即虎掌也。苏颂说甚明白。宋开宝不当重出南星条，今并入。”^[41]不过，对于虎掌或天南星的道地产区，刘文泰指为冀州和江州，但是以往多将天南星的出产描述为“生平泽，处处有之”。由于“汉方医士需要甚多，故常作大量交易”^[42]。据民国本草学家赵燏黄等人的调查：“禹州之天南星为该地土人所培植者，乃天南星科之块状根茎，各地药肆就近采用之。”^[43]境内的颍川里、镇定里、紫金里、古城寺等地都有大量种植。民国时期，禹州出产的天南星行销全国多地，且产量巨大。到1959年中国医学院科学院药物研究所等编著《中药志》时，重新确定了天南星的道地产区“以四川产量大，河南质量好，市场称禹南星或会南星”^{[44]100}，天南星遂发展成为禹州的“道地药材”。

白附子始载于南北朝《名医别录》，列为下品，“生蜀郡”^[45]。到唐代以后，随着国家疆域的变动，各地对白附子的出产认识加深，其出产以甘肃凉州为盛^[46]。此后，白附子的出产范围进一步扩大。明人卢之颐《本草乘雅半偈》云：“白附子，本出高丽及东海、新罗国，今出凉州，及辽东。生砂磧下湿地，独茎，类鼠尾草，细叶周匝，生于穗间。形似天雄，根如草乌头小者，长寸许，干皱有节。”^{[33]684}大体而言，唐代以后，白附子主要出产于甘肃凉州以及辽东地区，直到明代仍然保持着此格局。药学界一般认为历代本草所记述之白附子，为毛茛科植物黄花乌头，即今药材称之“关白附”^[47]。由于白附子能治疗头面游风斑斑、中风不语、诸风冷气、血痹冷疼、阴下虚痒等症，具有相对广阔的市场。乾隆时期，时人描述道：“此药久无真者，今惟凉州生，形如草乌头之小者，长寸许，干者皱纹有节，入药炒用。”^[48]

尽管全国多数地区出产的白附子并未进入本草学家的主流叙事，但是这并不妨碍当地的出产。就禹州而言，当地出产的白附子虽在明嘉靖《钧州志》已见记载，但长期以来无甚名气。直到民国时期，随着药材贸易的扩大，才开始进入药学家的视野。广州药商出身的陈仁山，长期出入药市，对各地销往广州的药材格外重视，他曾观察到禹州出产的白附子经由牛庄帮之手远销至广州，因而将其载入《药物出产辨》曰：“白附子，产河南禹州，近日多由牛庄帮运来。”^{[36]7}产自禹州的白附子之所以远销广州，显然是与其作为药材集散地有密切关系。不过，尽管此时禹州出产的白附子已占据一定的市场优势，但是并未上升至道地药材的程度。白附子真正成为禹州的道地药材，应该是在1949年以后。随着现代药学研究的进步，药学家逐渐认识到不同产区白附子的区别。同样是在1959年的《中药志》，将白附子分为天南星科独角莲和毛茛科黄花乌头，因此出现了“禹白附”和“关白附”之分^{[44]173-177}。其中，主产于河南禹州、长葛，以及陕西、四川、湖北、甘肃、山西等地的白附子，“因产于禹县者为道地品，故称禹白附”^[49]。此后，医药界多以禹州白附子为道地药材。

（三）全蝎

全蝎为动物类药材，受自然环境和气候条件的影响，长期以来主要出产于北方地区。宋代《本草图

经》载：“旧不著所出州土，注云出青州者良，今京东西及河陕州郡皆有之。”^{[32]525} 即全蝎以出产于河南和山东地区为盛。就禹州而言，尽管嘉靖《钧州志》也已见全蝎的记载，但是直到雍正时期，《河南通志》仍将全蝎的产地记为陈留^{[1]92-93}，这至少表明禹州出产的全蝎名气不甚显著，且未能引起时人的注意。清中期以后，禹州出产的全蝎逐渐兴起。清末民初徐珂编撰的《清稗类钞》曾记录一则轶闻：

河南之禹州盛产蝎，以可为祛疯之药。汉口人辄往购之。人仅一度，逾此，则往往遇害。蝎产于山，有王长其群。王大而最毒。同治末，粤寇乱粗定，鄂商至禹采蝎者益多，恒致巨富。有某者颇疑之，逾年复来。止于旅舍，满载欲归。是夜二鼓，忽暴风至。沙石为飞，蝎直扑旅馆，坏垣而入。土人群谓蝎王至矣。某大震，急以巨缸自覆，藏其中。蝎王绕缸三匝，乃出。风沙亦骤止。群起视之，缸已瓦解。某已殁于其中，若被火者。^{[50]183-184}

通过上述材料可以获悉，自太平天国以后，汉口对禹州药市的全蝎需求量激增，有大量的湖北商人到禹州采购全蝎。由于全蝎主要栖息于石缝或土缝间阴暗潮湿的地方，禹州西部和北部多山地丘陵区，适宜全蝎的生存与生长。每年春夏时节，有农民专门捕捉搜集，卖给药商。因而，在禹州山岗地区采集的全蝎，大量输往汉口。

随着国内市场需求增加，河南境内各地出产的全蝎，大多以禹州药会为集散地。光绪年间，南阳府出产的全蝎，每年达百余斤^[51]。南阳府所属之舞阳县北舞渡镇，每年秋季输往禹州的全蝎有 70 斤^[52]。新郑的全蝎，常年产量为 400 斤，行销汉口和禹州等地^[53]。此外，来自河南禹州及其附近的药商，将本地所产药材远贩至祁州药市，全蝎即为大宗药材之一^[54]。在禹州本地及外地的全蝎大量经由药市转输的过程中，逐渐开始享有“会全蝎”^[55]的名号。

大体而言，清中期以后，禹州药材市场迎来了大发展，至晚清民国走向鼎盛，且在全国具有重要影响力。当地相对丰富的药材资源固然为药材市场的形成和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但随着市场贸易的成熟和需求的扩大，药市反过来刺激了药材种植和采集的兴盛，并对“道地药材”格局予以重塑。其实，禹白芷、禹南星、禹白附子、会全蝎等所谓的禹州“道地药材”并非完全产自禹州，有相当一部分产自周边地区，以禹州为转输地，这些周边的药材共同参与到禹州“道地药材”的建构之中。如上述之白芷最初引进于长葛，后来才在禹州境内大范围种植。舞阳北舞渡出产的全蝎曾大量运往禹州转销。盖因如此，《中药名大典》干脆将禹南星定义为：“禹南星，又称会南星、禹州天南星，为产于河南，集散于禹州者。”^[56]可以说，禹州药材市场为生产于本地、周边诸县乃至河南境内的众多药材提供了集散的舞台。药材交易的盛行使得医家和药商能够更多地接触到各地所产的药材，并加以比较。受商业因素的影响，药商在交易中常惯以“道地药材”的名义突显所售药材的优质性，在药材转输时，习惯将其贴上“禹”或“会”字标签，以示与其他产区的区分，标榜药材的独特功效，最终推动这些在本地及周边有大量种植或生产的药材逐渐发展成为禹州药市的“道地药材”。

总之，清代以后，随着禹州药材市场的不断发展，本地药材种植逐渐兴起，禹州逐渐由原来单纯的药材转输功能，转变为自行生产和转输相结合的发展模式。从严格意义上来讲，禹州固然存在着相对丰富的药材资源，但这仅仅构成药材市场形成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在药市形成之时，禹州绝非著名的药材生产区，民国《禹县志》即指出：“药材则非禹产，而以禹为委输者也，内而全国二十二省。”^{[5]653} 民国时禹州地方要员王照青也揭示：“许多人不知道真实情形的，总以为禹州出产药材，其实禹州并不出产药材，即出产药材，也不过极少一部分。”^[57]禹州“道地药材”的出现和形成，除了传统意义上药材质量的评价外，还包含其他诸多复杂的因素。具体而言，既得益于本地发达的药材市场，更受到商业贸易等人文因素的影响。“道地药材”固然存在着医疗实践得来的药效高下之分，也存在着人文因素和市场机制等商业贸易等因素的参与，它并非是纯粹的科学概念，反而更多的是一种商业文化或社会心理的体现。

如果我们将视野放大到其他药市,就会发现一些著名的药市如安国、樟树、宁波等地,在药材市场形成之前,它们的药材出产或“道地药材”也并不发达。祁州“轮轨既不通行,且非产药之区”^[58]。樟树镇,“此外自粤蜀来者,集于樟镇,遂有药码头之号,实非土产”^[59]。宁波,“甬非产药之区,然清代因交通关系,实为全国输运枢纽之地”^[60]。从这些论述来看,清代以来药市地区的药材种植乃至“道地药材”的形成,更多的是一种典型的商业文化现象。这深刻地折射出药材市场能够充分利用商业的力量,从单纯的药材贸易,进而发展到本土引种栽培药材,甚至利用市场因素培育“道地药材”,以形成新的地方优势。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清代以来国内药材市场发展的逐步成熟,市场机制已然成为决定药材种植的重要因素,药市的药材生产逐渐呈现出从传统的“副业型”向“专业化”发展,这进一步刺激了本地的药材种植,最终导致了具有本地特色的“道地药材”的形成。“道地药材”的产地也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品种培植、市场推广等人文因素的演进不断更迭。因此,当我们在探究药市的成因时,如果单纯地将丰富的药材资源或“道地药材”作为这些著名药市的主要成因,不仅是无视市场机制和人文因素在形塑药物观念的作用,而且更容易忽略药材市场形成过程中诸多更具决定性的因素,这极有可能造成本末倒置的结果,出现认识上的误区。

参考文献

- [1] 雍正. 河南通志 [M] // 文渊阁四库全书: 史部第 294 册.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
- [2] 唐廷猷. 中国药业史 [M]. 3 版. 北京: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2013.
- [3] 刘凤. 明清中国药材市场的初步研究 [D]. 北京: 北京大学, 2007: 56.
- [4] 许檀. 清代晋商在禹州的经营活动: 兼论禹州药市的发展脉络 [J]. 史学集刊, 2020(1): 43-53, 64.
- [5] 民国禹县志 [M]. 台北: 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 1976.
- [6] 同治二年. 诰授朝议大夫调署禹州正堂马宽夫马大老爷永禁开设车行碑记 [M] // 孙彦春. 禹州中药志.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06.
- [7] 李留文. 洪山信仰与明清时期中原药材市场的变迁 [J]. 安徽史学, 2017(5): 27-34.
- [8] 成化元年. 密县感应牛郎神庙之碑记 [Z]. 现藏新密市洪山庙.
- [9] 道光. 尉氏县志 [M]. 清道光十一年刻本: 54.
- [10] 李绿园. 歧路灯 [M]. 李颖,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2004: 768.
- [11] 朱绍祖. 明清至民国禹州“药都”的形成与地域社会变迁 [D]. 天津: 南开大学, 2019: 164-193.
- [12] 尹会一. 尹少宰奏议 [M]. 张受长, 编. 新 1 版.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41.
- [13] 梁飞, 李健, 张卫, 等. 谈“道地药材”的形成原因 [J]. 中国中药杂志, 2013(3): 466-468.
- [14] 薛居正. 旧五代史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6: 1689.
- [15] 梅尧臣. 宛陵集 [M] // 《四部备要》集部. 上海: 中华书局, 1936: 2.
- [16] 沈括. 梦溪笔谈 [M]. 新 1 版.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61.
- [17] 民国. 许昌县志 [M].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87.
- [18] 各省农桑汇志 [J]. 东方杂志, 1905, 2(7): 233.
- [19] 万仁元, 方庆秋. 中华民国史史料长编 [M].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整编. 影印本.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3.
- [20] 嘉庆. 密县志 [M]. 清嘉庆二十二年刊本: 6.
- [21] 万剑非. 河南密县经济及合作调查: 附表 [J]. 中国农民银行月刊, 1937, 2(2): 50.
- [22] 曹炳章. 增订伪药条辨 [M]. 刘德荣, 点校. 福州: 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4: 49.
- [23] 河南省鄆陵县物产状况及行销情形 [J]. 工商半月刊, 1930, 2(9): 42-43.

- [24] 赵燏黄. 中国新本草图志 [M]. 赵爱华, 点校. 福州: 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6:31.
- [25] 陕西清理财政局编辑. 陕西全省财政说明书 [M]. 排印本. 清宣统元年:105.
- [26] 汪燕平. 从地道到科学: 近代甘草产地和形象的变迁 [J].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2019,34(2):5-17.
- [27] 贺扬灵. 察绥蒙民经济的解剖 [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35:89.
- [28] 刘景向. 河南新志 [M].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88.
- [29] 许昌地区药品生产、流通志编辑室. 许昌地区药品生产流通志 [M]. 许昌: 许昌地区药品生产、流通编辑室, 1985:56.
- [30] 王兴亚. 明清河南集市庙会会馆 [M].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8:118.
- [31] 禹县中药资源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关于四种地道药材的调查报告 [R]. 禹县: 河南省禹县中药资源普查办公室, 1987.
- [32] 苏颂. 本草图经 [M]. 尚志钧, 辑校. 合肥: 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4.
- [33] 卢之颐. 本草乘雅半偈 [M]. 冷方南, 王齐南, 校点.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86.
- [34] 贾俊祥. 遂宁“白芷”简介 [G] // 政协遂宁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遂宁市文史资料选刊第 1 辑, 1986:22.
- [35] 李永瑞. 长葛白芷 [G] // 政协河南省长葛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长葛文史资料第 3 辑, 1988:93.
- [36] 陈仁山. 药物出产辨 [M]. 铅印本. 广州: 广州中医专门学校, 1930.
- [37] 方星高. 遂宁白芷产销概况 [J]. 农林新报, 1939,16(12-14):26.
- [38] 孔夫子旧书网 [EB/OL]. [2022-12-26]. <https://book.kongfz.com/24686/215093681>.
- [39] 实业部中国经济年鉴编纂委员会. 中国经济年鉴: 第一回 [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34:242.
- [40] 赵燏黄. 本草药品实地之观察 [M]. 樊菊芬, 点校. 福州: 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6.
- [41] 李时珍. 本草纲目 [M]. 校点本.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75:1185.
- [42] 石户谷勉. 中国北部之药草 [M]. 沐绍良, 译. 重庆: 商务印书馆, 1946:11.
- [43] 赵燏黄, 朱晟. 华北药材初步之观察 [J]. 生物学杂志 (北平), 1937,1(4):117.
- [44] 中国医学院科学院药物研究所. 中药志: 第一册 [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59.
- [45] 陶弘景. 名医别录 [M]. 尚志钧, 辑校.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86:232.
- [46] 苏敬. 唐新修本草 [M]. 尚志钧, 辑校. 合肥: 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1:296.
- [47] 谢宗万. 中药材品种论述 [M].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1964:85-87.
- [48] 黄宫绣. 本草求真 [M]. 席与民, 朱肇和, 点校.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87:80.
- [49] 韩维恒. 中药正别名集 [M]. 2 版. 长沙: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5:71.
- [50] 徐珂. 清稗类钞: 第 34 册 [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17:183-184.
- [51] 潘守廉. 河南省南阳府南阳县户口地土物产畜牧表图说 [M]. 影印本. 台北: 成文出版社, 1968:26.
- [52] 《河南商业志》编辑室. 河南商业史料丛编: 第 3 辑 [G]. 郑州: 《河南商业志》编辑室, 1986:122.
- [53] 《河南土特产资料》编辑组. 河南土特产资料选编 [M]. 郑州: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6:171.
- [54] 刘华圃, 许子泰. 祁州庙会: 驰名全国的药材集散地 [G] //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河北文史资料选辑: 第 11 辑.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83:196.
- [55] 中国药学会中药研究委员会. 中药鉴定参考资料: 第一集 [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58:286.
- [56] 刘道清. 中药名大典 [M]. 郑州: 中原农民出版社, 1994:390.
- [57] 王灿藜. 漫谈小禹州的药材骡马大会 [M] //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禹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禹州文史资料: 第 6 辑. 1990:156.
- [58] 天津市档案馆. 天津商会档案资料汇编 (1912—1928): 第 4 册 [G].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2:3824.
- [59] 崇祯清江县志 [M] // 故宫博物院. 故宫珍本丛刊: 第 112 册. 海口: 海南出版社, 2001:36.
- [60] 民国鄞县通志 [M]. 台北: 成文出版社, 1973:2126.

(本文编辑 黄晓华)